

毛泽东书赠王维舟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缘由

吴 平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历时八十八天。这是一次用整风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检查边区工作的会议，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继续深入和发展。

当时，正值国际上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转守为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美、英两国也在太平洋战线上加强实力，对日军开始了局部反攻。在国内，我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军大规模的“扫荡”和“清剿”，使解放区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日军的力量还是强大的，他们仍不断向解放区进行“扫荡”。而蒋介石还在继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层层封锁和蚕食进攻，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必然异常艰苦。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抗日根据地总后方的陕甘宁边区，应该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以满足前方和后方广大军

民的要求，特别是物资上的供给，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这次会议正是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而召开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二百六十六人，旁听九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康生等出席了会议，并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最迫切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会期中，还正确地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争论；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明确规定了发展生产是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①

会议后期，对近年来领导边区经济建设和国营经济事业成绩昭著而又刻苦奉公、在群众中有信仰的二十二名干部进行表彰和奖励。毛泽东当即给受表彰的人员赠词，以资鼓励。给王震的赠词是：“有创造精神”；给习仲勋的赠词是：“党的利益第一位”；给王维舟的赠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给马锡五的赠词是：“一刻也离不开群众”；给马文瑞的赠词是：“密切联系群众”……②

① 引自《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221—228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② 引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工委《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运动》

毛泽东给王维舟的赠词，不仅概括了他在边区各项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而且也是对他长期以来为党为国的献身的高度评价。

罗传礼、孙邦达奋勇投笔

冉 健 隆

罗传礼（又名罗曙南），宣汉新街人。孙邦达，宣汉柏树乡人。他们在读小学的时候，虽然不同校，但都听过“九·一八”、“一·二八”的历史课，从小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1937年，罗传礼考入宣汉简师一班，1938年春，孙邦达考入宣汉简师二班。在抗日战争初期，宣汉简师校长陈宗海聘了一些进步教师，如谭三育、甘白水（他们都是沦陷区的青年）。在这些老师影响下，校内办起了《蒲城怒火》半月墙报，主编罗传礼，编委有爱好文学的陈本立、陈德生。内容有“半月时势”、“学校动态”、“抗日烽火”、“杂谈”、“学习心得”等栏。

谭、甘离校后，1938年初马永祥校长又聘来了唐昆育、陈策。在他们的指导下，部分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起“读书会”，订阅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大众生活》，购买了《静静的顿河》、《母亲》等苏联小说，每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在戴家酒房（现西门操场对面西北乡信用社）一间小房子里学习讨论。

1938年暑假，孙邦达回柏树在王寿民处借了八路军军发的《军用杂志》、《新中华报》等，下期开学时带来宣传罗传礼，供“读书会”学习。

1938年冬，日寇侵占了大半个中国的领土，广大青年积极投入抗日宣传活动。宣师、宣中的同学利用寒假时间，组织了一支深入农村的抗日宣传队，由罗传礼、陈本立负责剧目。这个宣传队走了二十多个乡、四十多个保，历时一月，行程一千多华里，使参加的成员亲眼看到了农民极端痛苦的生活。

1939年，暑假前后约有两个月时间没有收到所订的报刊，写信去问也得不到答复。没有精神粮食，真是心急如焚。下学期刚开学不久，戴家酒房突然收到一卷用《中央日报》的标签寄来的报纸，拆开一看，原来是十多期《新华日报》。“读书会”的成员像久逢干旱而下的喜雨，真是欢喜如狂。接着，不断轮流用《扫荡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正中书局》等标签，寄来多种革命读物。后来了解到进步书刊难于寄出的原因是国民党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这些革命报刊既宣传了抗日的路线、政策和主张，又介绍了延安抗大、鲁艺等院校的活动，使青年们都向往这个革命圣地。

1940年开学初，宣汉县国民党书记刘子觉发来两份入党申请书交马永祥校长，明确指定必须由罗传礼、孙邦达亲自填写。在这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他俩毅然选择了走。

三月下旬，“读书会”成员在戴家酒房开会，研究决定：罗、孙先去延安，其余成员暂时隐蔽。罗去联系桂云卿

(川东师范读书，因嫌疑是共产党开除回家，后到万源石塘坝铁厂工作)，孙回柏树场，请王寿民给以帮助。罗、孙两人确定，三月二十五最迟二十六日在宣汉城里碰头，谁条件成熟再决定行程。

二十九日晚还不见孙邦达的影子，罗约见我说：“三十一日是最后填写国民党申请书的限期，孙邦达还没来，我只好先走一步了。今后有人问，你只说我去重庆报考军需或警官学校。”

三十日凌晨，天上还有月光，罗身换蓝布长衫，脚穿草鞋，肩背一个小小包裹，踏上了人生的征途——决心去找党。我把他送到龙背河，才依依不舍地分别。

当他走到襄阳时，沿途岗警规定，没有县以上的路条，任何人都不能再往前走。无奈何，罗只得回到达县，立马给我写了一封信，探听宣汉对他的情况。接着，我给他写信，说明宣汉对他的去向不了解，总认为是去重庆考学校。鉴于此，可回来复学。九月初，他回宣师上课，直到毕业。

1941年春，罗在宣师毕业了，有好几个学校都聘他任教。但是，大年初一他又在宣汉消失了。原来是到广安戴市场中学投靠陈策、唐昆育老师去了。

1942年，罗到重庆，先后在江北半亭子小学、吕祖庙小学从事地下活动。1945年初，党派他回宣汉筹建外围组织。那时，宣汉的文教科长是陈竞为，因为师生关系，将罗安排在该科当科员。接着，他先后邀约了宣中、宣师、省达中、省达师部分毕业同学组建了“学友会”，秘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久，他被县长宋明忻抓捕入狱，经多方营救脱险，星夜赶回重庆。

1948年4月，“学友会”成员王德伟、陈本立、周洪礼、陈德生等被捕。陈德生在宣汉县国民党旬刊上发表了“悔过书”，供出罗传礼是共产党员。消息传到重庆，党立即将罗疏散到万县中心县委，化名罗曙南，分配到云阳、开县、奉节、巫山、巫溪等地开展地下活动。

1949年万县解放，罗历任《万州日报》总编辑、万县地委宣传部长、万县市人大副主任，现已离休。

一、1940年4月2日，孙邦达才赶到宣汉城，晚上找我问情况。我说：“认为你有事或者不会来了，罗推迟几天于三十日由万源方向走了。”他十分着急地说：“为了找关系，跑了好几天总算有了着落。明天我只好坐船去达县，由那儿出发。”

到达县后，他找到王寿民介绍同意一起去延安的刘素侠老师（她家在达县开设德兴和药房，他丈夫在延安），由她设法在达县取得了到西安的护照。五日，由达县起程，刘素侠坐滑竿，孙扮成药房的徒弟，还有一位药房管事柏明勋走路，一起从达县出发。

沿途一带盘问甚严，多次遇到险情。五月中旬末才到汉中，住在刘素侠药房的分店。几天后找到木炭汽车，又转乘火车，才到了西安。

他们在西安四次找八路军办事处都不接待，原来是国民党军在30日侵占了边区重镇——店头，双方戒严。他们面对这种情况研究决定：刘素侠是女同志，仍回达县另找机会（1941年，他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延安），孙就只身继续前进。

六月四日，刘素侠老师借了二十元钱给孙做路费，送他

到火车站，孙顺着城墙往北奔向延安。沿途遭到岗哨盘查，几次拘押、审问，他都说是四川达县德兴和药房汉中分店的徒弟，因为与师父走散了特来寻找，所以没有路条。他经过三原、耀县、同官、宜君等县不敢入城，只在城外小店住宿。

六月十九日，孙被国民党28师82团一营抓去，审问数次，都没有什么证据，强迫他留在营部当勤务兵。

六月二十六日，他趁营部无人时，偷了一张传令兵的路条，太阳下山时，穿着军装混出了卡子。当晚到达解放区洛川兵站，隔天下午送八路军检查站，又送鄜县警备司令部审查。孙如实将事实经过作了汇报。后来发了军衣，留在政治部刻钢板。八月，孙到延安。九月进抗大，从此投入了革命的摇篮。解放后，他任吉林省文联秘书长，现已离休。

当时，罗传礼二十岁，孙邦达十九岁，为什么先后从不同的渠道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呢？1948年冉启明到上海复旦大学复学，路过重庆找到罗传礼，罗说：“我们的脑壳是在国民党的手中。”刘素侠送孙邦达到西安火车站时，孙对她说：“明知此去是龙潭虎穴 凶多吉少，但我死而不悔。”这是何等崇高的理想，坚强的信念！有了这种理想和信念，就可以无坚不摧，战胜险滩，征服浊浪。

红色摇篮——万古楼学校

夏 仕 伟

万古楼小学，是川东游击军创始人王维舟在20年代接办清溪宏文校的同时，由地下党员倪正学以大甲长夏松浦之名举办的，并任校长。他以学校为掩护，积极组建游击队，白天上课，晚上下乡发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活动十分秘密。后因奸细告密，倪正学被捕，关进敌牢，惨遭毒刑，如“烧八筒花”（点燃一束香烧背）、“背外国背篋”（将烧着杠炭的油桶背在背上）等，于1929年8月，在宣汉县衙门内监牢活活折磨死。万古楼小学后由宏文校回家学生符材、夏仁浦相继任校长。

1933年，红军来了，苏维埃政府及政治部均设在万古楼小学。当时，万古楼村有不少父子、夫妇、兄妹相约一起，踊跃参军，如倪兴中、倪兴田、夏仕文、罗伦元等156名男女青年学生，随红军北上抗日。红军走了，王老走了，学校也变了，万古楼小学改名为“保国民学校”。从此广大农民子女被剥脱了学习文化的权利。万古楼苏区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熬煎，在漫长岁月中苦斗。

1950年，万古楼的天，晴朗光明；万古楼的人，欣悦欢快。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亲自批示将万古楼小学扩建为“宣汉县老君乡二中心校”。喜讯传来，万古楼村人民奔走相告，欢喜雀跃。村干部夏德政、夏德坤，教师夏仕伟、符代恩，王丕忠、夏仕贵等，积极筹建，群众兴学热情高涨，踊跃献工、献粮、献木料，共捐献稻谷15000市斤，捐树木110根，每户农民还捐桌凳一套。1953年春，万古楼村在外地工作的老红军、东海舰队后勤部长倪兴一中、内蒙古民政厅大队长倪兴田等，相继回家省亲，到学校视察指导。为了进一步改善学校的条件，他们除赞助稻谷2000多市斤，特别是倪兴中一人就赞助880市斤外，在返回原单位路过重庆时，又将学校具体情况向西南行政委员会作了详细汇报。王维舟又指示川北区文教厅帮助解决万古楼学校的具体困难。随即拨大米10000市斤，现金3000元。几位老同志返回单位又先后来信说：“王副主席很关心万古楼人民的教育，还指示学校一定要办好，下一代一定要教育好。你们应很好学习清溪宏文校的精神，让革命传统代代相传。”在革命老前辈的关心鼓舞下，学校师生及群众齐心协力，在这年底学校就建设得更宏伟壮观了。现在，全校面积4238.2平方米，教学用房和生活用房1393平方米，近年来，倪兴中等几位老同志又相继给学校赠送两个石英钟、一台收录机、全套初中英语磁带。

万古楼小学，是在王维舟等老一辈革命者的亲切关怀下建立和成长的，是万古楼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是教育下一代的活教材。当地群众深情地说：“我们现在看到这座教学

大楼，就等于看到了王老。”所以，万古楼流传着一首歌谣：

“万古楼学校放红光，
革命传统大发扬；
校舍文物当珍惜，
励精图志不忘党。”

祥柏书院燃起革命烽火

李 凡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黄金乡贡生罗富文倡议捐购学田，在油房街大桥北九龙山下的文昌宫，创办了一所启蒙教育书院。因院前有一古柏，需数人合抱于树桩，环生九株子柏，均高七、八丈许，苍翠葱笼，如九支巨笔参天，闻名远近，因之命名该校为“祥柏书院”。

民国三年(1914)，黄金的刘煜森、夏鸿钧等，联合厂溪、官渡(今新华)、老君、虾八口(今南坪)等六场热心教育的人士，继续捐购学田，增聘教员，将书院改建成“祥柏高等小学”。先后任祥柏校长的有夏鸿钧、江春旭、岳在明、罗兴鼎等八人，教师有张玉鉴、傅巨川、宋更新、修陶(焘)、王全仕、王波、李正益、严昭贤、周季方、张正月等20余人，其中有中共党员5人、进步人士4人。教师的学历也不错，清末文生2人，民国大学生5人，绥定联中、宣汉中學生10多人。

民国二十二年(1933)腊月，红军收缩阵地，奉命西进。军阀刘存厚之三师廖雨辰部，趁机将祥柏校舍全部拆毁，沿河修筑碉堡，以抗击红军。这所近百年的革命文化摇

篮遂毁于屠毒。

1928年前，祥柏校学生每次会考都失败，校长李金波听说宋更新在清溪与绅士不和，当年上期便抢先下聘，招宋来为祥柏校撑持门面。宋即赶赴开江与军委书记王维舟共商应聘事宜。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应聘。因为黄金地处偏僻，有利于建立据点，开展革命活动；同时与万源李家俊游击区接壤，便于建立宣、万联络网，扩大游击范围。宋到任后，又通过多方活动，先后将修焘、王全仕（王冰石）、王波、严昭贤等秘密党员也聘来任教。他们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首先是更新教学内容，传播革命思想。祥柏教师除讲授教科书、完成课业外，还自编了补充教材，寓革命道理于字里行间。如宋编写《鸡鸣声》一课教唱：“鸡声破晓，报导天亮了，穷人总是勤劳的好，起身须早，……噫！一日三餐，一家老少，要是懒惰怎得了？”这篇短文看似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其实饱含了极其深刻的寓意，渐近地灌输了革命思想。为了让高小毕业的学生继续有学习机会，老师们给校长建议，又开办了一个短期师训班，招收20来岁的高小生，得到校方允许。他们的本意是集中学习，便于灌输革命思想，暗地通过开江县开明书店发来地下党组织的进步书刊，如郭沫若的《创造》、鲁迅的《呐喊》，以及《少年维特之烦恼》、《少年漂泊者》等书，向学员宣传。名义上要他们结业后回家自谋职业，实际上将这些青年和进步教师加以培训，造就了革命的骨干力量。

其次是开展文艺宣传，激发革命行动。祥柏校的音乐、美术课由王波担任。他按学校计划，间周举行一次音乐晚

会，一学期演出一次大型新剧（文明戏）。还在“五一”扩大庆祝活动、“双十节”举行游行、开提灯会庆祝，向师生及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高唱《国际歌》。

1929年4月，李家俊率游击军在固军坝起义，与敌廖雨辰部打响第一枪。学校为发动群众，配合游击军向豪绅展开斗争，自编自演了《可怜的秋香》、《汪老二之死》等话剧，并由王波饰演秋香，揭露封建统治阶级霸产夺妻、残酷压榨农民的罪行，使广大群众认清了受苦受穷的根源和革命的对象。

再次是建立农会组织，开展锄恶斗争。中共宣汉县委于1929年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后，讨论决定加强农运工作。宋更新、修焘、王全仕等积极贯彻县委的决定，先后发展罗南山、覃天佑、罗孝元等30余人为农会会员，成立了由修焘、王全仕负责的黄金口农民协会，下设三个分会，罗南山负责黄金坪分会，罗孝元负责水鼓坝分会，王全仕负责油房街分会。仅半年便分片发展了农协会会员七、八十人，革命活动遍及全乡。

是年5月中旬，一姓舒的学生无辜被校长诬为“共产党”，说他反抗军饷，捉来吊打，并派团丁捣毁了家产，激起广大师生愤恨。7月，王全仕等老师组织了“锄恶小组”，准备报复校长，因被事先察觉未予如愿。1932年夏，一提款委员坐滑竿来黄金收款，却被埋伏在太平坝的游击队阻截，当场击毙。

革命活动的发展，激起了敌人的复辟仇恨。正当李家俊游击活动节节胜利之际，一个谋杀宋老师的罪恶行动开始了。当大雨滂沱的一个深夜，师生都已入睡，寝外一阵急促

的喊声：“宋先生，宋先生，快起来，你家有人会你来了。”宋立即锐敏地察觉事必蹊跷，便明确地答道：“现在雨大，明天来会。”次日拂晓，便轻装冒雨告别了师生，临行时说：“革命种子，已在祥柏校生根发芽，今后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我多走一个地方，也就会多播一处革命种子。”遂赴开江任市找王维舟去了。从此，黄金伪区长刘绍东大肆抓人，罗南山、罗孝元、蒋玉美、吴正和等先后被关押、刑讯。罗孝元终被修焘多方努力营救出来。但革命烈火如到处铺满了干柴，一触即发。当红军才从万源进到毛坝，黄金的严仕金、严昭贤就将早已做好的镰刀斧头红旗高高擎起，带领30余名队员远迎红军到来。红军一到，杀猪宰牛，打土豪，惩恶霸，分田分地真忙，选举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妇女会、担架队、儿童团和游击连、战斗连等革命武装。黄金区苏维埃成立在后街禹王宫，选举杜大伦为主席，罗孝元、吴正和当选为委员。它同官渡、沿山两区苏维埃一起，当时归属红胜县（今万源罗文）苏维埃领导。

觉悟起来的农民和回乡革命知识分子同祥柏校数十名师生一起，成为游击队骨干带头参军，全乡组成4个独立营、4个战斗连，总计2200余人，于1933年11月2日在西门操场参加成立红33军后，先后分别划归99师及红4军、红9军，开始了万里长征。

同盟会员李馥先生二三事

郭 泰 勋

宣汉县旧名东乡，自设立县治以来，历任县令、知县、知事和县长的，其数实在不少。然而，在这众多的父母官中，生前备受人民崇敬、死后又为之立祠祀之的，却仅只2人，即赵公祠的赵德遴和李公祠的李馥。这2人中，尤以李公受人崇敬。此外，还有刘将军祠的刘猛和罗公祠（全称“罗壮勇公祠”）的罗仕举，但此2人却是武官。

李馥，四川西昌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同盟会员。他忠心耿耿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反袁护法。曾任夔府知府、忠县知事、成都地方审判厅推事、代理刑庭庭长、岷江政法学校校长、护国军司令部参谋等职。民国五年（1916年）九月调任宣汉县知事。在任职期间，虽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却一身清白，公正廉明，热心教育，重视新学，深得人心。《志》称之为“颇有政声”。民国六年十二月反袁护法之战，不幸死于混战中。死后人民给以厚葬，并“特立祠祀之”。

旧《宣汉县志》卷八：官师上册为此事作了详细记载：“李馥，字策安，西昌人，同盟会员。……民国五年任宣汉

知事，（民国六年）靖国军营长王桢入城，巷战之。盖馥亦革命巨子，以未奉熊克武命（抗靖军入城），故死于乱军，非桢意也，县人因葬于城东，立祠祀之。”

1986年《宣汉县志资料》第四十期18——20页记载：“民国六年（1917年）川东护国军改称靖国军，颜德基任六师总司令，王桢（即王维舟）任靖国军第三团团长。是年十二月，孙中山通令宣布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乱国窃权罪状后，团长王桢率师进取宣汉，知县李策安未得熊克武通知，闭城抵抗。城破，巷战，馥死于乱军。”

“民国七年，……宣汉县议事会……又同意地方绅耆意见，以死难知事李策安亦系同盟会革命人士，并非袁氏爪牙，到任以来，颇有政声，县人因厚葬于城东，立祠（即李公祠）祀之。”

据现今尚健在的90多岁高龄的历史老人程康侯先生回忆说，李馥先生在宣汉任知事时，重视教育，推崇新学。民国六年，他积极支持当时宣汉第二大场官渡场开办新学堂，并亲自命名为“济川小学校”（此校即现今新华中心小学校的前身），学校大门上石刻的楹联也是李馥先生亲自所撰。其上下联的第一个字即分别取该校地名“官渡”二字。对联全文是：

官由初学入门，慢恃华夏诗书教他青年子弟；
渡过中流是岸，且将欧美文化强我共和国家。

李公祠在宣汉县旧城外东街上。后面不远处是过去的春牛坪，祠隔壁东边是李氏宗祠（即现今武装部所在地）。李公之墓在李公祠后面。1942年，李公祠被驻川军粮局直属第十六仓库宣汉分库所占，改装成军粮库。解放后，此处